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第二版)

孟繁华 程光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第二版)

孟繁华 程光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第二版) / 孟繁华, 程光炜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ISBN 978-7-300-09726-8

- I. 中…
II. ①孟…②程…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756 号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第二版)
孟繁华 程光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1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7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一、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来源	(1)
二、当代文学发展的特征	(4)
三、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	(7)
第一章 “当代文学”界说	(12)
第一节 基本文化方向的确立	(12)
第二节 文化语言的“转译”	(1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本土化	(16)
第四节 剩余的“多元文化”	(19)
第二章 当代文学“合法性”的建立	(24)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现场	(24)
第二节 两个报告文本	(25)
第三节 作家身份的确立与危机	(27)
第三章 当代文学的外部资源	(31)
第一节 与俄苏文学的历史渊源	(33)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37)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制度化	(40)
第四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	(45)
第四章 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	(51)
第一节 文化领导权的建立	(51)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	(54)
第三节 传媒的管理	(59)
第四节 “会议”的意义	(64)
第五章 文学的现代性实验	(69)
第一节 颂歌与狂欢	(69)

第二节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73)
第三节	何其芳的《回答》	(76)
第四节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	(82)
第五节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84)
第六章	“双百方针”时代	(88)
第一节	“双百方针”	(88)
第二节	青春写作	(91)
第三节	文学理论批评的讨论	(94)
第七章	激进文学的兴起	(99)
第一节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99)
第二节	《青春之歌》及讨论	(102)
第三节	赵树理现象	(107)
第四节	激进时期的“边缘”文学	(110)
第五节	姚文元现象	(113)
第八章	红色文学的繁荣	(119)
第一节	《红旗谱》、《红日》	(120)
第二节	《红岩》	(122)
第三节	柳青的《创业史》	(124)
第四节	革命历史的传奇化	(126)
第五节	《欧阳海之歌》	(129)
第六节	郭小川现象	(132)
第七节	贺敬之现象	(135)
第八节	戏剧的“现代”转换	(139)
第九节	《千万不要忘记》	(141)
第九章	革命文学的高涨	(147)
第一节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政治文化	(147)
第二节	“样板戏”美学	(150)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隐秘文学	(154)
第四节	激进文学的全面崩溃	(158)
第十章	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	(161)
第一节	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	(161)
第二节	“中国作协”和“社科院文学所”	(164)
第三节	“文学运动”的式微	(167)

第四节	外国文学翻译与先锋文学思潮	(170)
第十一章	曲折反复的开放年代	(180)
第一节	“伤痕文学”前史	(180)
第二节	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和分歧	(184)
第三节	《班主任》与“问题小说”	(187)
第四节	“朗诵热”时代的诗歌	(191)
第十二章	文学对历史叙述的参与	(199)
第一节	四次文代会	(199)
第二节	不同的知青文学	(202)
第三节	“归来者”群体的多样性	(205)
第四节	汪曾祺的出现	(210)
第五节	80年代的“评奖制度”	(213)
第十三章	受“翻译”影响的文学	(218)
第一节	外国文学的翻译与引进	(218)
第二节	朦胧诗出现前的“历史”	(221)
第三节	朦胧诗:在争论中写作	(224)
第四节	先锋话剧与“荒诞派戏剧”	(232)
第十四章	“现代派”的多种姿态	(237)
第一节	“现代派”想象	(237)
第二节	北京作家圈子与两篇小说	(241)
第三节	《山上的小屋》	(245)
第四节	第三代诗人	(248)
第十五章	1985年后的小说(一)	(254)
第一节	小说界的变化	(254)
第二节	“寻根”的理论和创作	(257)
第三节	韩少功、贾平凹的小说	(261)
第四节	阿城、莫言的小说	(265)
第十六章	1985年后的小说(二)	(270)
第一节	先锋小说的出场	(270)
第二节	马原等的小说	(274)
第三节	写实小说的态度	(277)
第四节	《一地鸡毛》、《烦恼人生》和《风景》	(281)

第十七章 90年代文化与文学	(287)
(17.1) 第一节 90年代的文化状况	(287)
(17.2) 第二节 大众文学的概念	(291)
(17.3) 第三节 文化和文学的不同姿态	(294)
(17.4) 第四节 《顽主》和《白鹿原》	(297)
(17.5) 第五节 “改刊”风潮	(300)
第十八章 90年代的文坛	(308)
(18.1) 第一节 女作家与女性文学	(308)
(18.2) 第二节 “60后”作家	(311)
(18.3) 第三节 余华等作家的小说	(314)
(18.4) 第四节 学者散文	(317)
(18.5) 第五节 90年代诗歌	(321)
第十九章 文化市场与文学生产	(326)
(19.1) 第一节 文学策划	(326)
(19.2) 第二节 历史回忆散文	(329)
(19.3) 第三节 “红色经典”的重版	(332)
(19.4) 第四节 长篇小说热	(335)
(19.5) 第五节 王安忆等的小说	(339)
(19.6) 第六节 “70后”作家	(341)
第二十章 新世纪文学	(345)
(20.1) 第一节 评价的分歧	(345)
(20.2) 第二节 整体性的破碎	(348)
(20.3) 第三节 重新发现的乡村	(351)
(20.4) 第四节 被复兴的“传统”	(357)
(20.5) 第五节 中篇小说	(365)
(20.6) 第六节 “新人民性”文学	(369)
(20.7) 第七节 文学批评	(373)
参考文献	(378)
第一版后记	(382)
第二版后记	(383)

绪 论

一、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来源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普遍认为它起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社会历史的文学断代方式，似乎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或者说，当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里不仅有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语境和规约条件，需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完成必要的资源准备，同时，历史叙事也需在形式中诉诸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来源，是不可能离开上述三个条件的。

20世纪40年代前后，是中国社会生活最为动荡的时期，或者说从这一时期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是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社会主题词。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原有的发展进程。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全国一切进步人士的梦想。因此，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都在表达着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患。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现实建立的密切联系，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这一语境，作为文学发展的规约性条件，进入当代中国之后得到继承和发展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后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才遮蔽了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对“非主流”作家的“重新发现”，是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发生变化之后的事情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对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和规约。”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作为必要和必需的资源准备的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或者说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那一时代的中国处在不同的状态之中，不仅有解放区、国统区，还有“沦陷区”。不同地区的文学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解放区的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仍然在当代产生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他们重要的、获得认同的作品，被选进了各种文学选本和课本，文学教育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文学精神、观念乃至形式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他们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进步和战斗的文学精神，以及对文学多种形式的积极、有效探索，始终是当代文学重要的遗产和宝贵的资源。至于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没有再写出重要的或符合人们期待的作品，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更边缘化的作家逐渐被“钩沉”，不仅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甚至像徐訏、张恨水等作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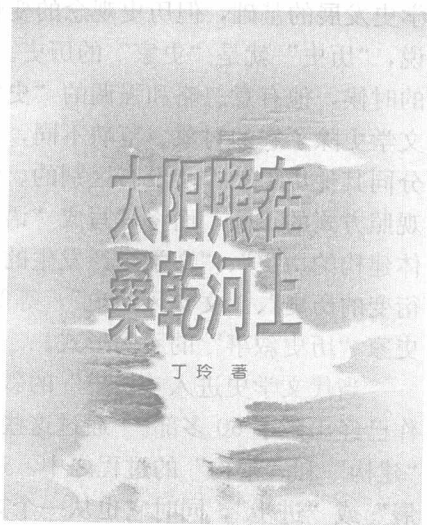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同时还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延安进步、革命的文艺家进行了全新的文艺实践。这个实践当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从这个时代开始，“新文化猜想”成为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来理解新文化的建设，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但对“新文化”具体理解和表达的问题仍然存在。毛泽东对此曾经有过不同的表述：“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这种新文化的阐发，还是建立在破坏旧文化基础上的，是以断裂的方式实

现变革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具体地阐发，但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对新文化的猜想和期待：这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为人民大众”的、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等等。它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文学所要坚持表达和研究的标准和尺度。

应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在“新文化猜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范本。这些范本，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等，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在对这些作品“历史化”叙述的过程中，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完成了。这个时期奠定的文学创作方向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文学艺术不断净化、纯粹、透明的要求才能够得以实现。也只有用这样的标准塑造的生活和文学艺术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

进入共和国之后，“战时”的文艺主张被移植到和平时期，局部地区的经验被放大到全国范围。社会主义雏形时期的文学终于在社会主义时代被全面推广。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

作为一个学科，当代文学的建立比当代文学的发生要晚许多年。这不仅源于“历史”与“叙述”不能平行进行的技术性困难，重要的是，当代文学也需要在形式的叙事中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历史的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封面



《暴风骤雨》封面

原貌就“呈现”的意义而言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绪论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以《伊利亚特》为例指出，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会发现其间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又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同《伊利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把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正是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但他赞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4]史料的钩沉与拓展构成了文学史发展的基础，但历史观念的变化和演进则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建构”“历史”的时候，他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他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史除了它的对象、范畴不同，其观念和叙述性，也就是它隐含的“虚构”成分同其他历史著作是没有区别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就可以因其叙述主体观照方式的不同，而将其写成“语义审美的历史”、“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本体建构的历史”、“文学生产发生的历史”、“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民族精神衍变的历史”、“文学风格史”，等等。这些“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是史家“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

当代文学史进入“历史”的叙事已有40多年的时间。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已经出版了60多部。^[5]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当代文学史处于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之中。这个有趣的现象不仅表明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或“进步”，同时它也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当代文学史家试图重构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

二、当代文学发展的特征

通过对当代文学思潮变迁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文学评价尺度的变化以及文学发展方向的确立一直处于“不确定性”之中。这个“不确定性”有意识形态控制的因素，但如果把“不确定性”完全归于“一体化”的统治是不公平的。原因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年代，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以霸权的方式诉诸全球化，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传统文化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

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将二者与中国的历史处境联系在一起。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革命的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性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涵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美国批评家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6]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中作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毛泽东的话“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做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作出选择后自豪的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暗含了他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同时也掩盖了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中国化”的胜利和“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在马克思的时代曾经以“天朝”闻名于世的国度，被称为“活化石”的国度，却让“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学说在它那里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这个矛盾的现象一直是历史学家的难解之谜。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人们，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创造出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可能性的工业先决条件——而且同时产生现代无产阶级，即注定要使那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面前的中国，马克思的当代弟子们却完成了现代最伟大的革命，并且是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完成的。^[7]这个历史事实让包括这位论者在内的历史学家感到匪夷所思。而且中国革命并不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是一个改变历史方向的突发政治事件，它没有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惊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的戏剧性革命事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8]

西方历史学家也终于在这个历史事实面前谈论起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来。或者说，是这个历史事实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他们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变成了

现实。但是，在抗拒一种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新中国周围，而这种矛盾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

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则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民族解放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9]

这些矛盾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以简化的方式做了处理。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人们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明确和稳定的理论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替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实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而方案的修订是以“政策和策略”的形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实验。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它所面对的矛盾时，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强调人的作用，一是强调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的物资积累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使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都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资的炫耀，而强调人的作用。但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当把“大写的人”当做符号的人对待的时候，这一理论就不会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力量：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秩序的规范，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时时需要忘我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对人的意志强调、控制的过程中，它只能是不合理的。

因此，在当代文学建构的初始阶段，规范性为这一领域留下的自由是相当有

限的。20世纪50—70年代，国家曾出台过大量的关于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召开过许多次关于文艺工作的会议，但是，这些方针和政策、会议，并不是鼓励文艺工作者的自由创作，而是教育、告知他们如何创作。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文献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的“不确定性”和非连贯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思想领域过于紧张、文艺创作和研究明显失常的情况下，便会出现一些宽松的方针和政策；而当文艺创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范围时，又会出现紧缩的方针、政策甚至运动。这些都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它所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终结，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恰恰从一个方面成为中国现代性的“表意形式”，而它的“不确定性”也构成了自身发展的特征。

三、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

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重要标示的，这一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与文学的等级关系。但这种叙述方式却难以客观地揭示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这一事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当代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从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文学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的理论讨论，但其目标大多是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不是出于对文学具体问题的兴趣。那些试图在文学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作家和批评家，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对文学的敏感和戒备，使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于是，在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和评价标准，也唯有如此，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文学家独立思考和艺术趣味的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革命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做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的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

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10]1918年，俄国科学院院长阿·彼·长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1]这种身份不明的悲剧，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对知识界的多次思想清理运动，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他们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和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2]表决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而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写小文章”上的，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3]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唯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在20世纪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在“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4]。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等充满战斗性的紧张的词语。当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5]；“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16]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于当代文学来说是十分普遍的。

一方面是紧张地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从茅盾、郭沫若、夏衍、赵树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都不乏检讨者，许多检讨都是在报刊公开发表的。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17]应该说，政治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就是周期性的震

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震荡不仅没有缓解文学家的压力，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就是在这样一种震荡中随风飘荡。但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纷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18]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就与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相似到这样的程度。

注释：

-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1版，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5、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绪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5] 根据辽宁大学王春荣老师的统计，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经发表了60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其中还不包括邵荃麟、茅盾、周扬等具有文学史价值的文章以及以体裁、专题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其书目如下：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册），山东大学中文系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东师院中文系编著，科学出版社，1962。
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试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作家出版社，1963。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林曼叔、海枫、程海著，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
中国当代文学史（1—3），复旦大学等全国22家高校合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5年陆续出齐，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二次印行。
当代文学概观，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涛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郭志刚、董键、曲本陆、陈美兰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中国当代文学讲稿，张炯等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
中国当代文学（3册），王庆生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984、1989。
中国当代文学史，蔡宗隽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新时期文学六年，张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当代文学简史，汪华藻等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公仲主编，丁玲作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
中国当代文学，北京自修大学教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6。
中国当代文学，邱岚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
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谭宪昭等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中国当代文学简明教程，王锐等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
新时期文学，周鉴铭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

- 中国当代文学，吴之元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
- 中国当代文学，张钟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新中国文学发展史，李丛中主编，杨振昆等副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88。
- 当代文学新编，张暹明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 中国当代文学史略，邱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上下册），郑观年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
- 中国当代文学扫描，陈涛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 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张广益等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 中国当代文学史略，李达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
-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上下册），高文升等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简明中国当代文学，周红兴主编，作家出版社，1990。
- 中国当代文学，戴克强等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中国当代文学论稿，田怡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 新中国文学史，舒其惠、汪华藻等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林湮、金汉、邓星雨等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 中国当代文学史，江西大学中文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
-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王惠云等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 中国当代文学，雷敢等主编，王愚作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中国当代文学史，舒其惠、汪华藻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当代中国文学史，刘文田、周相海、郭文静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
-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高文池、陈惠忠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当代文学四十年，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 中国当代文学，李旦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中国当代文学史，陈其光主编，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
- 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鲁原、刘敏言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 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李丛中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
- 20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续），徐国纶、王春荣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冯忠一、朱开轩主编，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
- 中国当代文学，阎其男主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
- 中国当代文学，刘景荣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 当代中国文学史纲，何寅泰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 新中国文学史略，刘锡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中国文学通史，当代卷，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
-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於可训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